

# 知識份子的民間崗位在哪裏？

## ——書陸鍵東著《陳寅恪的最後20年》後

● 陳思和

有關陳寅恪先生的傳記裏，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不是最好的一種，卻是最受人注意的一種。為甚麼這樣說？第一、這本傳記繞開了對陳寅恪先生晚年著述的學術價值估評，着重渲染其感懷寄託的弦外之音，這雖不能顯現寅恪先生獨立群山之巔的存在價值，但對現社會一般知識份子而言，極需從被稱為「學人魂」的寅恪先生身上所獲的，不是其學術本相而是其為學之魂，若真要詳釋寅恪先生的學術真諦，恐非陸氏這本傳記所能承擔，亦非這本書的讀者真正需求，所以正逢其好；第二，這本傳記與其說是成熟的史傳著作，毋寧說是一部文情並茂的文學傳記，書中不少文句矯飾而煽情，平平常常的事情一經文學筆法寫出，就成了一部英雄傳奇，使人想起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但對屢經挫折的中國當代知識份子而言，彼此間相看兩厭的，不過是折了翅、拔了毛的落水雞而已，非是一隻騰空飛出、遍體生輝的火之鳳凰，不足以振其聾而發其聵，所以，這本傳記少了些含蓄樸質，多了些傷感矯飾，也正逢其時。

上述兩點，雖可說是這本傳記「不是最好」的證據，同時也似乎說明其受到讀者歡迎的社會心理，這是當前讀書界浮躁之氣未除的表現，也恰

好說明了當前中國大陸精神領域想要甚麼和缺少甚麼。

一般來說，稼軒《採桑子》詞說明兩種寫作和讀書的境界，「少年不識愁滋味」是一層境界，為文學的境界，熱烈傷感濃之，含蓄樸質缺之；「卻道天涼好個秋」又是一層境界，那是歷史的境界，深刻通達有之，生命熱血淡之。陸鍵東這本傳記為文學傳記，屬第一層境界，而所傳傳主卻是史學大師寅恪先生，恰是以少年之春風春情寫生命的晚熟金秋，我們僅見一秋風秋雨、紅妝素裹的寅恪先生，未見一老樹枯澀、獨立天地間元氣渾成的寅恪先生。但以寅恪先生之大，後人實難傳其精魂之萬一，能有文學的寅恪先生再現於世，作為當前精神領域之偶像足矣。

或幸陸氏有不識愁滋味的少年之心，才會睜大了驚異的眼睛去了解專制時代某些習以為常的現象。書中大量引用的未刊檔案，尤其是寅恪先生服務單位中山大學年復一年暗中搜集、匯報的「陳寅恪材料」、「陳寅恪近況」之類的動態報告，在當年都是作為內部分析知識份子動向的依據，以供權力者掌握「敵情」之用。這種今人看來毛骨悚然的鬼魅行徑，當年何止用於寅恪先生那樣的「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據賈植芳先生著回憶錄《獄裏獄外》所載，先生於1955年因胡

風一案入獄，在監獄裏已聞有人搜集田漢、陽翰笙等人的歷史問題，而田陽諸公此時還負責着大陸文化界的主要領導之職，正在舉手揮拳聲討「胡風份子」。對革命一生的知識份子尚且如此絕情，遑論統戰對象之異己份子。這類視知識者為敵人的鬼魅行徑，其實也不必髮指，在中外專制國家裏一向是很平常的事情，即便在號稱民主的國家裏也難絕迹，若著名畫家畢加索，不也在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監控之下渡過了幾十年的春秋嗎？但這本傳記以秘籍檔案入傳，畢竟開了當代人物傳記的一個新領域，使人公然獲知，長達幾十年的歷史竟有陰陽兩界之分，僅以公開披露的材料、文字等立傳，不過是人物的「陽界」一面，而被鬼魅們操縱的「陰界」隱伏在昏暗中不見天日，「陽界」的許多現象終究得不到真實的邏輯的解釋。以寅恪先生為例，假若沒有發生文化大革命，也許這些鬼魅行徑終究是鬼魅行徑，於寅恪先生也終究無損，先生壽終正寢之日，仍會像朱師轍那樣，沐浴在一片光輝之下。知識份子幾近宿命的悲劇因未昭然幕啟而呈現另外一種演出形式，或許是更深刻的形式。

現在似乎很難推究，當年寅恪先生決定留居嶺表的真實心理，這本傳記從傳主生命旅程的最後20年寫起，開卷即劈面遭遇寅恪先生去留大難之疑，海內外學界、廟堂之間，對此均有辯論，可是傳記只用了「有着很深的原因」一句含混過去，這是過於輕巧之弊的一證。作者用文學筆法渲染了陳序經等外部種種因素，卻很少入虎穴探虎子，深入到寅恪先生的心理深處去尋求原因。寅恪先生是一個極其頑強而獨特的生命個體，其在對自己後半生去留大事的選擇與決定上，不會與張伯苓相同，也不會與吳宓相同，倒是與寅恪先生為人很不相同的馮友蘭先生，說出了一段很中肯的解

說：「靜安先生與寅恪先生為研究、了解中國傳統之兩學者，一則自沉，一則突走，其意一也。……一者何？仁也。」斯言者誠，以傳統文化顧命人自居的兩大學者，在風雲突變的歲月裏，一個選擇自沉以殉文化，一個選擇「突走」後的豹隱嶺南，以生的方法來完成另一種形式——「自沉」。馮友蘭先生識其「突走」卻未識其留居之意義，也就是其與傳統文化共存亡之心態，這就不是一般的叔齊伯夷不忍之心所能涵蓋，也不是那些認定此舉乃寅恪先生錯着之棋的海外學者輩所能理解。寅恪先生不會輕易走出國門，也就是他要用他的睿智與膽識，實踐一條現代知識份子終將會走通的，遠離廟堂，續命河汾之路。甚麼叫「續命河汾」之路？其典出自隋代大儒王通隱居河汾講學，守先待後，使傳統文化如汾水之流從自己身上流淌過去，發揚光大。寅恪先生一生為人師表，自命「續命河汾夢亦休」，吟出此句時為1949年，若作廣義解，「續命河汾」也不僅僅是設杏壇執教鞭，而應有更深大的意義，即守住知識份子的民間崗位，在政治權力以外，建構起自成一體的知識價值體系，並在這價值體系內實踐並完成現代知識份子對歷史對人生以至對文化的責任與使命。在傳統的讀書人中，即便是苟且性命於亂世的諸葛亮王通之輩，其南陽躬耕也好，河汾教席也好，行文出處的最終價值仍在廟堂，廟堂不存，文化也難免看得輕些。所以有靜安先生的自沉，而寅恪先生明知廟堂者舊朝既崩，新朝未卜，但他仍舊決定了自己的去留，以一具殘廢之身來嘗試新的道路，即現代知識份子的民間崗位。堅定了這個心思，才會有他答覆科學院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兩個條件。他是明知這兩個條件不會兌現，而舞項莊之劍意在重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驚天動

地的旗幟，凝聚了一代以至幾代知識份子血淚與生命的精神標記。這篇「答覆」是值得回味再三的。寅恪先生首先重申這「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出典，為1929年國民黨統一中國之際首次提出，現又重申，表明不專對共產黨政權而言。然後再次闡明「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只是為了劃清廟堂的政治權力價值與民間的知識權力價值的分界，使晚清以來知識份子與廟堂權力者長期糾葛不清的對立、衝突、參與、爭寵等恩怨孽緣得一了斷。或可追溯，寅恪先生提出「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是在民國達成一統之際，也就是知識份子將永遠告別傳統士大夫的身分，將重新確定其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之際。靜安先生之死與寅恪先生首倡「獨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看作是古代士人到現代知識份子的轉型即將完成。自然，一方面是廟堂的封建王者（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代表）的僵屍尚在作祟；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未必就脫胎換骨，根除了廟堂意識，以後幾十年知識份子的坎坷史均可證明這一點。然而寅恪先生的超前意識和現代意識，也只有在半個多世紀的沉痛教訓中，才會慢慢地被後來者所領悟、所感受，這正是寅恪先生精神不死的當下意義。

確定寅恪先生對中國現代知識份子轉型期的奠基性貢獻，寅恪先生是最後20年間寂寞的生命旅程之謎就能迎刃而解。寅恪先生以洞察政治歷史的明睿與通達，在專制體制下從容不迫地工作，如履薄冰又游刃有餘，一次次在無數的「動態」、「近況」邊上有驚無險，終以廟堂民間兩條平行線的方式安然無恙。至於文革大限，那是超出了歷史常軌的瘋狂，為聖人所難料。若以此說來衡量這本傳記，陸鍵東先生之功在於敏銳感受到時代對寅恪先生的理解所在，及時用文學筆法一勾沉出日常事物背後之「象」——

陸氏謂之「生命」，並以知識份子的家世背景、學術淵源參照之，或多或少傳出了某種信息，這是時代風氣所需，也是幾代知識份子苦求之精魂所在。但其病也在時代風氣所致，現時代對寅恪先生之「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呼喚，依然是寄託了五四以來知識份子屢遭失敗的廣場意識，所以浮躁之氣不絕，發揚的仍是抽象的獨立人格與氣節，卻未見寅恪先生所以能實踐這一民間崗位上的工作，還是有賴於他的為世人所不達的知識體系。寅恪先生瞽目而著書百萬言，臨死前還念念不忘以其科學治學方法傳世，這都表明了一個學者以生命來維護的究竟是甚麼。如果說，古代的王通「續命河汾」仍不過是士人走通廟堂的另一種形式，相傳其授弟子數千，唐朝開國功臣房玄齡、魏徵等人均出其門；而陳寅恪先生更看重的卻是韓愈在文化上的「獎掖後進，開啟來學」，在文化上薪盡火傳開啟後世。他說：世傳隋末王通講學河汾，卒開唐代貞觀之治，此固未必可信，讓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後來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運動，史證明確，則不容置疑者也。其心嚮往之者，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在新朝開國之初，率先發出的是「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不是」的師訓，以專業知識為價值取向，以民間崗位為立足根基，才有了不曲學阿世的根本所在。若不強調專業知識的一面，甚至漠視它，那人格與氣節，依然停留在梁漱溟式的士大夫品位之上，依然不能傳出寅恪先生的現代精神之真諦。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本傳記，未能總結寅恪先生學術成就及研究方法經驗，終是件遺憾事。但其輕者，也是時代之輕也。

陳思和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評論家。